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

1875年4月—1883年5月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邓仁娥
设计: 尹凤阁 王师颉
装帧设计: 程凤琴
责任校对: 刘大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 版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4
ISBN 7-01-002964-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 - 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549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二十五卷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2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9.375 插页 12

字数: 754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01-002964-4/A·246 定价: 56.00 元

ISBN 7-01-002964-4



9 787010 029641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参加本卷译文译校工作的有：

王宏道 冯世熹 韦建桦 李其庆

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

章丽莉 王栋华 李锁贵 朱 羿 冯如馥
胡永钦 唐春华 沈 延 刘洪涛 李 楠

全卷译文由李成毅、王宏道审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 6.《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75 年 4 月至 1883 年 5 月的著作。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尖锐化了。第一国际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任务而停止活动，国际工人运动进入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期。

这期间，马克思继续从事《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恩格斯则继续撰写自 1873 年开始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并于 1876—1878 年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与下创作和出版了《反杜林论》。他们密切关注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并注意利用这些新成就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们还全力支持年轻的工人政党，帮助它们制定科学的纲领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指导它们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卷收入的大部分文献反映了他们对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关心帮助和理论指导。

本卷首篇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1875 年初，德国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实行合并，共同起草了供哥达合并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马克思对纲领草案逐段作了批注，批判了其中的拉萨尔主

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新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按劳分配的原则，“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见本卷第18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平等权利仍然受到限制，因为“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见本卷第19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20页）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集体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后来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表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见本卷第145页）。

马克思根据对1848—1849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明确提出未来新社会产生过程中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

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本卷第 28 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论点,根据自己的再生理论指出,只有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建立后备基金、支付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后,才谈得上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他还驳斥了“分配决定论”,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见本卷第 20 页)。因此,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而把重点放在分配上面,是根本错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一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重要文献。1878 年 10 月德国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异常艰难的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封通告信,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了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阻止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对党的政策施加影响。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作了论述。他们强调,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特征”,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见本卷第 362 页)。他们着重指出,这个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他们要求党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坚定不移地同感伤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斗争,屏弃那些博爱的资产者,以保持党的领导的纯

洁性。

在《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斗争采取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不决定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只有“当该社会中的掌权者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但是‘和平的’运动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当时的俾斯麦政府正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导致暴力革命”。(见本卷第338—339页)马克思在揭露俾斯麦政府利用谋刺皇帝事件诬陷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分子毫无共同之处,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文章草稿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反映在马克思于1878年12月同来访的《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的谈话中(见本卷附录)。

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的请求,帮助他们起草纲领,马克思口授了《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在导言草案中,马克思阐明了“生产者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见本卷第442页)。他还给法国工人党指明了在经济方面的最终目标并提出了包括利用普选权在内的策略原则。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改编成《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上,并出版了法文单行本;1882年恩格斯又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请求,经进一步加工后出版德文单行本,改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原理。恩格斯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说明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的产物,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学说的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恩格斯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述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指出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见本卷第402页),“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见本卷第399页)。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胜利。恩格斯还评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形式,如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指出:这些社会化形式是资本家阶级在猛烈增长的生产力要求承认其社会性质的压力下,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不得不采取的。“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见本卷第407页)“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见本卷第408页)他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样生产力才有充分发展的自由。他还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这部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普及,对于各国工人政党掌握科学社会主义,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该书法文版前言中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本卷第441页)。

马克思为法国社会党人草拟的《工人调查表》,共提出近一百个

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进行这样的调查，能够确切地了解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种种形式和方法，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十分确切的事实材料来开展和领导工人运动。

自 1877 年 2 月底至 1879 年 3 月底，恩格斯在意大利革命工人组织上意大利联合会的机关报《平民报》上发表了《关于 1877 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米的信》、《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等五篇文章，帮助意大利工人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向他们介绍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成就和经验，从而指明他们所面临的斗争任务。

本卷收入的多篇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和美国的实际来指导这两个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恩格斯给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占有突出的地位。

1877—1878 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大批英国工人遭到沉重打击，广大工人群众越来越不满现状，越来越关心社会问题，表现了某种政治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应邀为该报撰稿，自 1881 年 5 月初至 8 月初，共写了 11 篇文章。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英国工人当时极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介绍了欧洲大陆各国工人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研究了这一斗争的发展趋势。在《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等文章中，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必须以“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见本卷第 491 页）这个口号来取代“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一已经过时的旧口号；“工人阶级除非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

原料、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否则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见本卷第494页)。

《工联》这篇文章,评论了英国工联的功过,论述了单有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还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原因。恩格斯指出,“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见本卷第499页);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工人政党》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希望英国工人阶级不再充当自由党的尾巴,而是要像德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工人阶级那样,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为取得政治权利、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

在《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中,恩格斯根据新兴的工业国、特别是美国商品的竞争,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预言世界工业中心不久将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恩格斯在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根据对英国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得出结论说:“资本家阶级也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由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就能够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越来越成为一种祸害了。”(见本卷第537页)

恩格斯为美国一家周刊《劳动旗帜》撰写的一组文章《1877年的欧洲工人》,向美国工人介绍了第一国际解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总趋势和主要任务,评述了欧洲各国工人党的斗争和发展,宣传了第一国际的优良传统。恩格斯在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就指出,1877年是欧洲工人阶级“大有收获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扩大工人

政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曾经为一个虽小但很活跃的宗派所威胁的团结,实际上已经得到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愈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争得显著地位,而且各种政治事件……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见本卷第 163 页)。恩格斯在第四篇文章中赞扬了大革命以来法国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充当欧洲革命先锋的作用,分析了法国工人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 1870 年以来法国农民对帝国的信心开始动摇,农民的这种政治觉醒为法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并肯定“城市工人同乡村农民结成联盟之日正在临近”(见本卷第 179 页)。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详细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环境和运动的发展情况,指出在俄国“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见本卷第 181 页),不可避免的俄国革命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每个国家的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被看作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迈出的巨大的一步”(见本卷第 18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他们大量阅读了俄国的文献资料,结识了一些俄国革命者、学者和思想家,深入研究了 1861 年农村改革后俄国的经济、土地制度和社会关系。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个草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反映了他们对俄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和历史作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马克思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得

出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见本卷第461页）马克思指出，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广泛保存下来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见本卷第465页）。但是俄国1861年的改革以后，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见本卷第463页）。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见本卷第469页）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卷第548页）

在上述两封信中，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说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似乎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同一条道路。他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简单的类比，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他强调，只有对具体的

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如果只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见本卷第14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论东方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阐述了关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基本见解。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应该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这不仅是主持正义,而且也符合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变革的因素大量存在),从而会大大加速整个欧洲的剧变”(见本卷第15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同情和关心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他们与波兰革命者保持密切交往,通过各种形式支持和声援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和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1830年波兰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两篇文章,热情赞扬了波兰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气概,赞扬了他们对欧洲革命斗争作出的贡献,同时呼吁他们把自己的斗争同俄国阶级兄弟的斗争联合起来。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对原始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卷的不少材料反映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恩格斯的《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描述了日耳曼民族在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历史概况。恩格斯根据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日耳曼人的居住领域和各个部落的情况,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作了概略的叙述。在《法兰克时代》这部手稿中,恩格斯探讨了封建社会初期的所有制关系和法律关系,说明了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条件是怎样造成的,